

## 编者前言

费了整整三年多的功夫，这套由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上百名图书馆学、目录学专家和地方志专家们通力合作，集体劳动的结晶——《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在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直接支持与具体合作下，其各分册的书稿多已数经编审与修改，即陆续可交付投入印刷了。

承蒙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同志，中国地方史志专家、前辈学者朱士嘉同志为本丛书题签，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王季平同志，中国地方史志专家、前辈学者傅振伦同志为本丛书撰写了序言，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和有关专家、学者、书法家们分别为丛书各分册写序或题签，或慨然允诺担任本丛书顾问，特别是王季平同志和中共吉林省委副秘书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江涛同志、吉林省文化厅顾问李石常同志、省文化厅厅长吴景春同志和省图书馆顾问王化长同志、吉林省图书馆原馆长许鼎同志等对本丛书的编辑出版给予大力支持，这使我们丛书的编者和各分册的撰稿者倍受鼓舞，大家内心的喜悦之情远非笔墨所能表达，在此，我们对领导和专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图书馆界多年以来在为读者提供地方志遗产的咨询服务工作中的体会，我们感到对浩如烟海的地方志遗产进行分地区的研究，对方志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鉴于绝大部分的方志遗产是藏在图书馆里的，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于一九八〇成立了地方史志研究组，邀请国内各省、市、自治区的有关专家撰写文章，在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支持下，于一九八一年十月，编辑出版了《中国地方志论丛》。

此后不久，地方史志研究组又提出了将原《中国地方志论丛》的内容加以扩展，使之向具体化，纵深化和有序化的方向再进一步研究、介绍的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首先，在原《中国地方志总论》一书基础上，编辑《中国地方志论集》。从我国1911—1983年近百种报刊中收录、选辑有关地方志的论文共六十余篇，分建国前后两册出版，作为本丛书的总论部分，书后附有1950—1983年中国地方志论文索引。

其次，在原《中国地方志分论》一书基础上提出《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一度曾题为《中国地方志考评》丛书）主体部分的编辑方案和组稿计划。我们的宗旨是：对全国每一省、市、自治区的方志遗产分别编辑出版专书予以深入、具体的评析和介绍；将我国方志遗产作为一个系统对待，通过整体性和有序性的专评，使这整个文化信息构成大厦的阶梯层次和全面结构轮廓，逐渐呈现在读者面前，供有效地利用。一九八二年五月，我们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有关专家发出倡议，确定了《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各分册的主编及撰稿人。

这一编辑计划得到了全国同行们的积极响应，各分册的主编都真正地尽到了责任，他们或身体力行、全力以赴，或与同仁们鼎力协作。在将本省、市、自治区范围内的全部方志研读一遍的基础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抓住主要特点，评介志书价值，然后撰写成文。根据丛书编辑体例的要求，现在各分册的内容一般皆以该省级现行行政区划辖下的地区、行署、省辖市（州、盟）为单元立题，有多少地区级建置，即写多少篇考评文章。大体上说，每省级下辖的地区级方

志,是以旧府志、厅志、州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同时也未忽略对其属下的县级方志(包括土司、卫所、山川、寺庙志乃至重要的乡镇志)的研究与介绍。每篇文章字数均从实际出发,材料丰富者多写,单薄者少写,力求用宏取精、爬梳抉剔,使这批科研成果在汇编成册时,在本地的方志宝库与读者利用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起着一种信息媒介的作用。

本丛书是集体努力的成果,在三年多时间内,我们地方史志研究组的同志只不过是起了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即使这些微的作用,也未能如愿尽责。由于我们人少力单,学浅闻隘,无论在总体设计还是在每种书稿的编审过程中,力不从心和事与愿违的情况,是比比出现的。加之,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志遗产分布很不平衡,各分册的撰稿者所下功夫或深或浅,难能一致,故丛书的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为此,尚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在本丛书初审稿件时,曾得到北京图书馆徐文绪同志、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谢灼华同志、首都图书馆冯秉文同志、青海图书馆陈超同志、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倪波等同志的关怀和协助,我们愿借丛书的出版来表达感激之情。尤其令我们难忘的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吉林省省长栗又文同志,在他古稀之年任职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期间,一直对编辑本套丛书予以关怀,并多次派他的秘书高甫同志向编委们传达他的具体指示意见。遗憾的是,在丛书编辑过程中,栗老溘然长逝。他身虽永息,遗志人间。我们今天仅以丛书的出版告慰前辈英魂,倘栗老有知,当含笑于九泉了。

金恩晖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

## 序

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在我国源远流长。文化之邦浙江素来就有修志传统，经过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给我们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地方志，成为一笔用之不尽的巨大财富。

“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作为我国地方志开端的《越绝书》，完成于东汉，其中就记载了浙江部分地区的山川、宫殿、人物等等。浙江的方志编纂不仅时间早，而且数量多，现存的宋、元地方志中浙江的地方志就占了很大的一部份。据清朝乾隆年间编辑的《四库全书》其中采录浙江的地方志就有十五种，二百六十七卷，在全国各省中是名列前茅的。《临安三志》、《四明六志》、《剡录》、民国的《龙游县志》以及《南浔镇志》等，在我国地方志中都是享有盛誉的。浙江人文荟萃，不仅编出过不少名志，还哺育了不少著名的方志学家。如清代方志学大师章学诚就是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他少时受到家乡各方的影响，不喜章句之学，而专心研究史学，后来主编过不少地方志，还独具精思，提出了一整套方志理论，为中国方志学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民国时期浙江龙游人余绍宋，主修过《龙游县志》，受到了各方好评，他主持拟订的《重修浙江通志体例纲要》、《浙江省通志编纂大纲》，对方志编纂工作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浙江的旧方志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比较系统完整的资料，我们可以从中去粗取精，吸取有益的东西，在今天两个文明建设中起到咨询、借鉴和教育的作用。近年来，不少县在修

志过程中，利用旧志的资料来规划城镇建设、掌握自然灾害、开发旅游事业、发展传统产品和当地土特产品生产以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乡土教育等等，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也给我们启示和勉励，使我们认识到方志编纂工作本身就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什么外加的任务。我们应该发扬浙江修志的优良传统，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和新的资料来修纂无愧于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新方志。

魏 桥

一九八四年八月于浙江

省社会科学院

# 前 言

《浙江方志概论》是分地区概述地方志发展的沿革，试对我省方志发展历史作初步的探略。

参加本书撰稿的作者有杭州大学、杭州师院、绍兴师专、省图书馆、省地名办、省工运史编写办、宁波文管会、温州文管会、温州医学院、临海博物馆等单位十多人，中有多年从事地方史志研究的中老年学者，亦有刚从大学历史系毕业不久的年青同志，各人分区撰稿，后由主编林正秋定稿。副主编孟文镛、金敏也参加全书的审定工作。此外，陈仰光同志也作了较多的工作。

其主要执笔者为：

|        |             |
|--------|-------------|
| 浙江方志概述 | 林正秋         |
| 杭州方志   | 杨小法 金 敏     |
| 宁波方志   | 林士民         |
| 温州方志   | 徐顺平、徐定水、潘国存 |
| 嘉兴方志   | 金 敏         |
| 湖州方志   | 陈仰光         |
| 舟山方志   | 张克夫         |
| 绍兴方志   | 孟文镛         |
| 金华方志   | 陈仰光         |
| 台州方志   | 郑文斌、丁 汲     |
| 丽水方志   | 单建明         |

本书的问世，得到了我省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浙江省

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编审魏桥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撰序；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浙江省书法协会会长郭仲选先生为本书题签。杭州师院科研处负责人李立心，中文系蔡勇飞副教授与地方史研究室诸同志也伸出友谊之手，鼎力扶植；金敏同志对全书文字作了润色；来自全国各地的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与杭州师院合办的地方志专修班学员还为书稿誉缮等等，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但成书匆匆，错误、疏漏之处尚多，诸望方家匡正。

林正秋

1984年国庆节于杭州师院地方史研究室

# 目 录

|          |     |         |
|----------|-----|---------|
| 编者前言     | 金恩晖 | ( 1 )   |
| 序        |     | ( 1 )   |
| 前言       |     | ( 1 )   |
| 一、浙江方志概述 |     | ( 1 )   |
| 二、地市方志论略 |     | ( 14 )  |
| (一) 杭州方志 |     | ( 14 )  |
| (二) 宁波方志 |     | ( 29 )  |
| (三) 温州方志 |     | ( 42 )  |
| (四) 嘉兴方志 |     | ( 61 )  |
| (五) 湖州方志 |     | ( 70 )  |
| (六) 舟山方志 |     | ( 97 )  |
| (七) 绍兴方志 |     | ( 115 ) |
| (八) 金华方志 |     | ( 131 ) |
| (九) 台州方志 |     | ( 158 ) |
| (十) 丽水方志 |     | ( 182 ) |

# 浙江方志概论

## 一、浙江方志概述

我国编纂地方志的历史十分悠久。据朱士嘉先生《中国地方志综录》（1958年商务版）著录，有各种地方志书七千四百多种，数量之钜，时间之早，于此可以想见。

按地方志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比较繁荣、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地方志乘，往往产生较早，编纂较多，内容也比较丰富。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土壤肥沃，物产丰饶，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现证明，距今七千年前，先民已生息在这块滨海的土地上。我省面积虽居全国末位，但自古迄今，经常成为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特别发达的地区之一，因此，浙江素称“文化荟萃，著述斐然”<sup>①</sup>之邦。我省地方史志，源远流长，种类繁多，在祖国方志学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浙江地方志始于何时？一般的看法是把《越绝书》（东汉袁康、吴平编撰）当作浙江乃至全国的第一部方志。清人洪亮吉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sup>②</sup>近世多数学者亦宗尚洪说，认为此书是“国内现存最古的地方志”。我们则持不同看法。

《越绝书》并非方志，把它归入地方史之林更妥。理由有三：其一，《越绝书》现存十五卷，全书与《吴越春秋》

相出入，主要记述吴越争霸的历史，尤着重于伍员、范蠡、文种、计倪等人的活动。全书以子胥去国而楚亡、夫差报仇而吴兴、勾践尝胆而灭吴三事为经。撰述以史为主，偶及吴、越部分地区的地理沿革，不同于史、地并重的地方志。其二，作者多采异闻传说，于道、术、魂魄、阴阳等虚妄之事津津乐道，追叙重要史实或考核舆地方位则甚为粗疏，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其“虽本史实，并含异闻”，是介乎历史与小说之间的载籍。其三，《越绝书》体例颇杂，释名者似字书，载言者类语录，志怪者近小说，迥异后世方志之门类清晰、义例划一。看来，《隋书·经籍志》将它列为“杂史”，《宋史·艺文志》将它列为“霸史”，《四库全书》又采录此书入“史部·载记类”（按：一般方志，《四库全书》均列入“史部·地理类”），均以地方史目之，应该说是

有道理的。

《越绝书》产生于东汉，有其客观历史原因。春秋战国时期，浙江政治嬗变多端，经济发展缓慢，自难与中原诸国的先进文化相比肩。秦统一中国后，浙江政局渐趋稳定。历经两汉，战祸不及，生产上升，文化逐渐繁昌。同时，东汉光武帝刘秀为表彰乡里之盛，诏撰《南阳风俗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隋书·经籍志》），包括《越绝书》在内的各种著述便应运而生。

## 二

自三国以迄南北朝，中原连岁征战，兵燹不息，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在地方割据局面下，浙江偏居江南一隅，相对稳定，经济发展尤得天独厚。加之，东吴、东晋和南朝四代，

政治中心相继置于江南，统治者迫切需要了解江南各地的风俗、人物、田赋、户丁、山川、关隘等基本情况，以供政治、经济及军事决策之用。为适应这种需要，以反映某一地区地理概况（包括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为主的“地志”，便大批问世了。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浙江方始出现“雏型”状态的地方志。

这种“雏型”的浙江地方志，择其要者，有如下列：

《分吴、会、丹阳三郡记》三卷。清雍正《浙江通志》列此记为“两浙志乘”之首，似可看作我省第一部地志。此记书名首见于《旧唐书·经籍志》，然不著撰人。原书佚亡，《太平御览》尚辑存若干佚文，如“人事部”：“土城者，勾践时得西施、郑旦，作土城贮之”；“兵部”：“卞山者，勾践于此山铸铜”；“礼仪部”：“种山，大夫种所葬也”。从这些零星载述揣想，本书记述内容大致为东汉以后三郡的地理概况。

《会稽郡故书杂集》（载《鲁迅全集》第十卷），是鲁迅早期辑录的古代逸书集。计收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象赞》、朱育《会稽土地记》、贺循《会稽记》、孔灵符《会稽记》和夏侯曾先《会稽地记》八种。所录逸文，大抵辑自唐宋类书及其他古籍，并经校勘补益。前四种记古代会稽的人物事迹，后四种载古代会稽的山川地理、名胜传说。鲁迅《序》称：“书中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遗，舍此更不可见”，学术价值甚高。侯康《补三国艺文志》称誉《会稽先贤传》云：“《御览》屡引之。所记诸人事，多史传之佚文。严遵二条，足补《后汉书》本传

之阙。陈业二条，足以证《吴志·虞翻传》注。吉光片羽，皆可宝也。”又如朱育《会稽土地记》，所言皆涉地理，是最古的一部会稽地志。鲁迅辑本一卷，仅录记载山阴、长山的佚文各一则；而两则均被《世说新语·言语篇》注所称引，其中一则复被嘉泰《会稽志》引用。

《钱唐记》，南朝刘宋刘道真撰。此书专记古代杭州的地理概况。《后汉书》注、《水经注》及《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都曾多处引用过它<sup>③</sup>。可惜的是，《钱唐记》早已逸失，我们今天已无从窥见全豹了。

《吴兴记》，刘宋山谦之撰。原三卷，现存一卷本乃清人缪荃荪所辑。此书专记古吴兴郡之地理，它的内容曾被《后汉书》注、《世说新语》注及《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寰宇记》等称引过。残存的一卷本，仍是我们研究地理沿革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

《永嘉郡记》一卷，刘宋郑缉之撰。清人孙贻让耗巨大精力，从类书和其他史志中爬梳拾掇，集腋成裘，方为后人留下现在所见的这个辑佚本。《永嘉郡记》纪述了大量的古代永嘉地理概况和民间传说，编纂温州地方志时很有参考价值。

魏晋南北朝的地志，留传至今者屈指可数，我们今天只能略窥鳞爪。虽然如此，撰于此一时期的浙江地志，仍有若干特点值得注意：一、载述内容曾被历代史籍和类书所广泛称引，史料价值较高；因此，传世者固无完本，但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二、我省地志的辑佚本，至今尚有十余种之多。就全国而言，已属名列前茅。三、从体裁形式着眼，则

它们或记地理，或叙风俗，或传人物，或述事迹，大多内容单一，文字简略，体例也不严谨，自然不能与后来方志的规模相提并论，不过是地方志的雏形而已。

### 三

隋、唐之际，国家重新统一，经济、文化都获得一定发展，原来破坏较少的江南尤其繁荣富庶。自隋炀帝“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sup>④</sup>以来，隋、唐两代全国性的区域志不断面世。传世的《元和郡县图志》，集汉、唐地理志之大成，开后世一统志的端绪，为历代学者所重。其中关于浙东观察使所领之越、婺、衢、处、温、台、明七州三十八县的载述<sup>⑤</sup>，是后来纂修浙江方志者经常查阅的重要史料。

这个时期，由于中央诏令地方修志（中唐以后，还规定各州郡编造图经送交职方），由是“图经”形式的地方志极为发达。惜乎仅因当时需要而纂，随用随编，用完即了，不甚注意保存，以后复遭五代之乱，幸存者直如凤毛麟角。据我们所知，与我省有关的唯唐人陆广微的《吴地记》一种，经“后人采掇成编，又窜入他说以足卷帙”<sup>⑥</sup>，辑为一卷，采入《四库全书》。此书立足吴郡，杂记史地，相当接近于宋以后的方志。说明隋唐时期以“图经”为主的地方志，已脱离初级阶段，开始趋向定型。

宋朝是我国方志史上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方志数量激增，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统计，两宋方志近六百种，大大超过汉唐方志的总和，几于“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记录焉”<sup>⑦</sup>；另一方面，方志体例渐备，为后

来方志的发展创制了规模，诚如《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小序所说：自宋代编撰的《太平寰宇记》出，“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元、明以后，体例相沿”。

北宋时，北疆外患频仍，江南远离边陲，全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东南数省（包括浙江）已成朝廷财政、物资的主要取给地，所谓“国家根本，仰给东南”<sup>⑧</sup>。特别是宋室南迁，定都临安，浙江一跃而成京畿重地，促使经济与文化比翼双飞。至于元朝代宋，由于异族入主，民族传统不同，地方志的修纂是承续南宋余绪的。

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宋元时期（其中又以南宋为主），浙江的地方志突飞猛进地发展，具有三点鲜明的特色：其一，宋元方志流传至今者不过二十余种，浙江一省竟占三分之二左右；当时两浙方志数量之巨，由此可以想见。其二，隋唐时期纂修的图经，目的仅仅为了向中央呈报，大抵详于地理，略于人文，或专记某一方面，体例不甚详备；南宋以还，大批涌现的州郡志，内容包罗万象，“记载……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sup>⑨</sup>而州郡志中之佼佼者，则多数系浙江方志。其三，比较注重资料的考证和校订，方志的学术价值空前提高。可以这样断定：浙江地方志的定型，即在此一时期。

宋元时期的方志，首荐《严州图经》。严州故治，位于今建德县境。原书八卷，今存三卷。“四库”未收，且称其已佚，想当时未之见也。此志为宋高宗绍兴年间所修，是迄今可见的宋代最早图经；至孝宗淳熙时，刻本改称《新定志》，故《舆地纪胜》、《直斋书录解題》、《文献通考》俱著录《新定志》篇目，“图经”之名遂湮。此一事实，具

体反映了图经逐步嬗变为地方志的过程。故《严州图经》素为历代方志学家注目。此外，此书首卷载郡志，以下诸卷分别为所属县志。各县皆自列门类，按沿革、分野、风俗、户口、学校、军营、坊市、物产、土贡、人物等项分别载述，不与郡志相混。这种编撰义例，与后此的宝庆《四明志》等如出一辙，可供我们寻绎县志单独成书的缘由。至于具列自晋迄宋的户口数字，能补史书不载之阙；对罗城周长的考订，可纠前人记述失实之讹等等，则其在学术研究上的作用是毋待赘言的。

再者，宋人高似孙纂修的《剡录》同样值得一谈。嵊县于汉代为剡县，《剡录》即嵊县志。此志共十卷，编次有序，条理秩然，行文简约古雅，引证赅博精审。它的编纂义例，常被后人所仿效：“其先贤传，每事必注其所据之书，可为《地志》纪人物之法；其山水记，仿酈道元《水经注》例，脉络井然而风景如睹，亦可为《地志》纪山水之法。”（《四库全书总目》语）其“草木禽鱼诂”，详考各种物产，兼及有关传说，信而有征，舒卷自如。卷六“书、文”门，著录阮裕、王羲之、谢灵运等十四人的著述和阮、王、谢三氏家谱之名目共四十二种，各列卷数，又开创方志记载地方著述书目之先例。《剡录》问世之初已饮誉文坛，历久弥新，成为我省一部著名的地方志。

另外，南宋“临安三志”足供后世修方志者借鉴。乾道《临安志》，原书十五卷，逾明已佚，今存残本三卷。此书叙述简赅，详略得宜。所载内容，常为后起的《淳祐志》和《咸淳志》所本，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杭州地方志。尤其它的第三卷胪列了自三国以迄乾道初年的历朝历任临安牧守的姓

氏里贯，并一一就其生平和宦迹作了简括的介绍，这对研究南宋以前的杭州历史颇有价值。淳祐《临安志》，今存残本六卷，是清朝嘉庆年间发现的。此书宋刊本早佚，原书卷数无从考知。纪述简雅，征引赅洽，对杭州城市的变迁与沿革叙述甚备，系探索南宋以前杭州城市发展情况的重要史料。书中还大量引用杭州最早的《祥符图经》（早已散佚），为研究宋代方志修纂史提供了线索。咸淳《临安志》，原书一百卷，今存九十五卷。此志叙述详赡，体例井然。采录内容，较前此二志增益甚多；复对前志材料“征考详核”，力求准确可靠。卷首所刊的《宫城图》、《京城图》、《浙江图》、《西湖图》，乃现存的南宋都城最古地图。这些文字和舆图，既补充了《宋史》记载都城的粗疏，又为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和清人傅王露《西湖志》、翟灏《湖山便览》等介绍西湖风景诸书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为此，朱彝尊、杭世骏等推崇它是浙江地方志中的“上驷”。

还有必要提一下常棠纂修的《澈水志》。志成于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共八卷，分地理、山水、廨舍、坊巷、古迹、物产、碑记、诗咏等十五门。书名《澈水志》，取“澈水者，盖《水经》所载谷水流出为澈浦者是也”<sup>⑩</sup>，实系澈浦镇志，非如晚近某些方志论文所谓的“山水志”。绍定《澈水志》，乃传世乡镇志中最古的一部，研究郡县志、乡镇志者似不可不读。

除此之外，宋、元“四明六志”和嘉泰《会稽志》、嘉定《赤城志》、至元《嘉禾志》等，也都是宋元时期的浙江传世名志。

#### 四

明、清两代，中国基本处于大一统的局面，尤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在江南产生。加之，朱明王朝积极倡导“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sup>①</sup>，各级政府十分重视修纂方志。各地方志一修再修，蔚为风气。清朝代明，经济、文化继续繁荣。清政府把地方志当做“昭同轨、同文、同伦之盛”的得力工具，三令五申，诏“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通志”<sup>②</sup>。以后，更严令各省、府、州、县每隔六十年必须修志一次。乾嘉之际，三次修纂一统志，形成举国修志的高潮，各地相继设立修志局，使编纂方志几乎成为一项制度化的经常性工作。清代所修方志，无论卷数、品类或质量，均达到空前的规模，是我国方志编纂史上的鼎盛时期。

浙江于此时期，方志的修纂亦称全盛。如从方志体例规模的发展来看，则浙江方志至此亦臻完备。具体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宋、元以州郡志为主；明代以后，浙江才出现全省性的通志、县志和乡镇志，并且自省至镇几于处处有志。方志的大小品类，到明、清业已完备，后世修志的地域范围再难突破。其次，所修之志比较注意经济史料的搜集。现存各府府志和部分县、镇志中，收集了相当丰富的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材料，说明我省明清方志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又提高了一步，开始接近近代方志的编纂原则。复次，文笔或疏或密，体例或简或繁，视需要而定。往往前志简者详之，前志备者略之，古今相承，力避重复。这一点，从全局观察，恰是方志进入完备阶段的标志之一。第四，定期修